胡说

胡适的智慧

魏邦良 著



无论思想启蒙，还是学术革新，胡适可谓是现代中国第一人

救人者先救己，
胡适一生救人无数，就因为他先拯救了自己

读胡适留下的一句句格言，宛如追循他留下的足迹，激励自己在日益世俗的生活中努力向上，奋力前行……

新视角★新材料★全新呈现大师人生智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卷 序言 1
第一章 代序：温润是胡适的仁 1
第二卷 胡适喜欢的格言 1
第三卷 胡适喜欢的徽州土话 73
第四卷 关于胡适 83
第一章 胡适的“诤臣”“诤友”理想和实践 83
第二章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胡适醮着月光写情诗 96
第三章 在春风里——胡适对弟子的教诲与呵护 140
第四章 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162
第五章 胡适与学潮 174
第六章 胡适的演讲 182
第七章 胡适的嗜书癖 189
第八章 “晚上可爱，那是我最好的时间” 198
第九章 戴着“杜威”的眼镜读孔子 204
第十章 艰难的独立之路 215
第十一章 胡适的乐观与信心 222
第十二章 江冬秀：“最后的一位‘福人’” 233

第一卷 序言

第一章 代序：温润是胡适的仁

2004 年，我在《开放时代》发表了本人第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此后，我对胡适的阅读和研究，虽断断续续，却一直未停。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当今学界对胡适虽不能说已过度诠释，至少也是充分阐释了。如此，对胡适我还有继续阅读与研究的必要吗？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能不能找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胡适，写一篇“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关于胡适的文章？这几乎是妄想。但这个念头却一直纠缠着我，挥之不去，直到那一刻——我想到那些散落在胡适作品中的格言——如同散落在大海里的星星。那些令我难忘、令我深思、令我回味的格言警句，据我所知，当今学界，尚未有人对这些格言做“一网打尽”的整理和“竭泽而渔”的研究。那么，我何不率先对这些闪光的格言来一次耐心的“打捞”？

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翻阅胡适的日记、讲演、文集。终于，完成了《胡适的格言》一文。此文在《读库》上发表后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这也验证了胡适那句话：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心栽花，当然要发。

第二卷 胡适喜欢的格言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因为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1911 年 6 月 7 日，胡适与好友章希吕谈如何根治“无恒”之通病。胡适开出三剂药方：

一、 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二、 每日常课之外，须自定课程而敬谨守之。

三、时时自警醒。如懈怠时，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古谚）、“德不进，学不勇，只可责志”（朱子）、“精神愈用则愈出”（曾文正）之类，置诸座右，以代严师益友，则庶乎有济乎。

你看，在胡适眼中，格言竟然可以“代严师益友”，其作用可想而知！

胡适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非常喜欢、重视格言。他利用所办的《竞业旬报》不时向读者介绍国外名著中的格言，以求“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

胡适那个时期曾写过一篇《读书札记(一)•读〈爱国二童子传〉》，把《爱国二童子传》这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中的格言译出。胡适在文中说:“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呢！”现摘录几段以求窥见一斑：

美成洛将死，乃张目作凄恋，颇闻微息作声，大类微风之吹入，颇辨析为“法国”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

……

天下所重者，咸在自食其力。

……

凡人得资于分外者，即奇富亦不足为荣显矣。（中国那些梦想发横财的听着。）

天下为尽分，方能立功。

……

伯尔亚（法国的大将）母训子曰：汝第一节，勿为妄言；必力与妄为敌，节劳自爱，宏量爱人，见人之难，必力趋就，勿萌伤人之心。

伯尔亚将死，尚呼其步卒，扶之倚树而立，力回面斥敌师曰：我虽死终不示汝以背也。（这句话的意思，说大凡逃走的人必定把背脊朝着人，如今我虽死，终不肯逃走。）（中国的兵听着。）

……

人不以学名者，不能为人。

《竞业旬报》是中国最早要求用白话行文的报纸，不过，胡适在翻译这些格言时还是采用了古雅的文言，以求庄重和简练。

在《竞业旬报》34 期至 38 期中，胡适将美国马威克所著《真国民》一书中的格言全部译出，并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完毕。这里摘录其中的一小部分：

智者游于村落，其所得益，较之他人环游全欧者，尚为巨也。（约翰生）

诚也者，使吾人清明，为白日之昭昭然。（弥儿敦）（即弥尔顿）

我惟以一言相规曰："为主而勿为奴也。"（拿破仑）

凡人之价值，皆自铸之。（西纳）（即席勒）

投资本而得利，未有若教育之厚者也。（伊略脱）（Eliot,即艾略特）

教育之目的，教育之结果，无他，道德之进化而已。（派克）（即赫尔巴特）

无阅历之人，虽入丛林，不能得薪。（俄谚）

学问者，灵魂之目也。（华生）

天下之人，惟日与学问相习。求学之思，乃日以炽。（司丹）

夙慧不足恃也，必也其勤乎。（贺佳斯）（William Hogarth，即荷加斯）

惰人与死人无异。（马登）（即奥利森巴•马登）

无一定目的之希望，不能久也。（高来里奇）（即柯勒律治）

人生须立志，不则营营扰扰过一生耳。（彼得）

成功者，战胜艰巨而得之者也。（司迈你）（即斯迈尔斯）

逐两兔，必不能得其一。（佛兰林）（即富兰克林）

人生至要之事，无他，惟定一定之宗旨而果决以赴之耳。（贵推）（即歌德）

克己者，英雄之本色也。（伊茂生）（即爱默生）

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里散落着大量的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格言。在我看来，这些格言充分证明了那句话：浓缩的就是精华。另外，这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格言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别致而独特的窗口，从中，我们可对胡适博大精深的思想来一次惊鸿一瞥。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句格言源自荷马史诗，它表明了一种强烈的自信，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睥睨一切的气概。

1917年3月8日，胡适在日记里首次提到这句格言及出处。当时，胡适是将此格言写作：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伊利亚特》18章125行）

胡适在日记里对此格言做如是评价："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1919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演讲中，胡适用这格言概括了他所谓的"少年中国之精神"：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翻译过来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英国19世纪曾爆发过一次宗教革新运动，史称"牛津运动"。运动的几个领袖客白尔、纽曼、福鲁德等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决心改革。运动之前，纽曼引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以示决心。这句诗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在演讲的最后，胡适大声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当胡适从美国学成归来，决心发动一场文学革命时，他就是用这句格言来激励自己及其同道的：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1935年，胡适和康奈尔大学的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小旅行团，乘火车，游览了平绥路全程。时任平绥路局长的沈立孙也毕业于康奈尔，只是比胡适晚了几年，另外还有几位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平绥铁路机务工务的工作。胡适此次旅行的目的是参观这几个同学在短时期中取得的成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平绥路原本是一条最

没希望的路，这一次在胡适眼中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胡适由此发了一番感慨：

“我常爱对留学回来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中，英国有一个宗教运动，叫做‘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后来投入天主教成为主教的牛（纽）曼（Cardinal Newman）。纽曼和他的同志们作了不少的宗教诗歌，写在一本小册子上。在册子的前面，纽曼题了一句荷马的诗，他自己译成英文：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曾译成中文，就是：‘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我常说，个个留学生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做我们的口号。可惜许多留学回来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气魄敢接受这句口号。这一回我们看了我们的一位少年同学（沈局长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最短时期中把一条最腐败的铁路变换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可见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以使山河变色，纽曼的格言是不难做到的。”

[功不唐捐]

这句格言源自佛教《法华经》，原文是“福不唐捐”，胡适将其改为“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

1932 年 6 月 27 日，胡适在题为《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说道：“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1953 年，在台北“记者之家”，胡适发表演讲，题目是《报业的真精神》。演讲中，胡适以“功不唐捐”勉励报业人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干一番事业：

“我认为办报只要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继续不断地努力做去，终是有效的。佛教《法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意思说，努力是不白费的。”

胡适以自己发动文学革命的例子证明奋斗就会成功。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行业——报业，确是无冕帝王，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笔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对这一行业有信心，只要我们的主张是站得住的，有材料，有证据，不为私，是为公，以公平的态度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功不唐捐’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提倡白话文运动，四年小成，十年大成，终于普及全国，这就是一个证明。”

胡适认为，应该把“功不唐捐”视为一种信仰。

在演讲的结尾，胡适说：“谨以‘功不唐捐’作为‘记者之家’的格言。”

1960 年 6 月 18 日，胡适应邀在台南成功大学某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演讲。

胡适对毕业班同学说：“今天我用老大哥的资格，应该送你们一点小礼物。我要送你们的小礼物只是一个防身的药方，给你们离开校门，进入大世界，做随时防身救急之用的一个药方。这个防身药方只有三味药：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

关于“问题丹”，胡适说：

“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做伴，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年轻入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两个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脑子里，时时向你挑战，时时笑你不能对付它，不能奈何它，时时引诱你去想它。

“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智识上的长进了。”

关于“兴趣散”，胡适说：

“这就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意儿。不是为吃饭而是心里喜欢做的，用闲暇时间做的——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活动也许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关于“信心汤”，胡适说：

“这就是说：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以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

“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努力是没有结果的……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Faith moves mountains）,又说‘功不唐捐’，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这里，胡适再次引用了“功不唐捐”这句话。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早在 1919 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胡适说“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关于“证实”，胡适这样说：“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胡适因此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1952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胡适在台北市台湾大学作演讲，题目是《治学方法》。胡适说：“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

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方法。对这一方法，胡适在演讲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

所谓假设，就是当问题出现后，“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所以，倘想解决问题，必须允许人人都可以提出假设，而“假设”有否价值或价值大小则取决于作假设者经验的多寡和学问的深浅。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

不过，胡适提醒我们不是每种假设都是值得“求证”的，在“小心的求证”之前，应对各种“假设”进行仔细选择、甄别，“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然后予以求证。

胡适的这一方法源自杜威的《思维术》。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对此做了说明：

“杜威最风行的著作之一便是那本举世熟知的《思维术》——尤其是那一本为一般学校和师范大学所采用的薄薄的原版。在我进哥大之前，我已对《思维术》发生兴趣，也受其影响。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这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由此获得启发:“杜威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其治学十字诀也由此形成。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听了胡适的十字诀，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地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著名学者萧公权对胡适的十字诀做了深入思考，得出如下结论: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阶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萧公权提出在“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之间加入一个“放眼看书”阶段，堪称真知灼见，是对胡适治学十字诀的合理而有益的补充。

胡适喜欢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面再加一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就是说，这句话重心在后面的“求证”。胡适认为，如果能重视证据，就不会被人骗。1958 年 4 月 10 日，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再次提到了这句话：

“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

在胡适心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学会这种方法等于学到了防身的本领。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做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世，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重大的贡献之一，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自由中国》1959 年 3 月 14 日第 26 卷第 6 期发表了胡适的名篇《容忍与自由》。文章的一开始，胡适写道：“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胡适激赏这句话，说：“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由大师的这句话，胡适进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对“容忍与自由”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 1948 年 9 月 4 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讲《自由主义》时，就对“容忍与自由”的关系作了很精彩的阐释：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讲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自由了……

“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布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发表后，引起了热议。

毛子水写了《〈容忍与自由〉书后》对此文大加赞扬，并指出胡适此文的哲学基础是宋朝大学问家吕伯恭的两句话：“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殷海光也写了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书后》。文中，殷海光一面赞同胡适主张的容忍，盛赞胡适此文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异议。他说：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还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1959 年 11 月 20 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题目还是《容忍与自由》。演讲中，他认同了毛子水的看法。

“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讲‘明善、察理’的。所谓‘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就是说善与理是不容易明白的。过了十二三年，毛先生又引用了这两句话。所谓‘理未易明’，就是说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这不但是我写《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的哲学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

对殷海光的疑问，胡适也作了回答：

“殷先生的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是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使有权有势的人感到危险的原因。所以他们要想种种法子，大部分是习惯上的，来反对别人的自由。诚如殷海光先生说的，用权用惯了，颐指气使惯了。不过他们背后的这个观念倒是准确的：这一班穷书生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所以今天我要请殷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想一想，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殷海光写的《胡适论〈容忍与自由〉书后》并非他内心真实的看法。在给弟子黄展骥的信中，殷海光表达了自己对胡适此文的真实看法：

“胡适那两篇《容忍与自由》根本就是胡适胡说，我当时看了内心着实不快，但又考虑到怕人快慰于自由主义者的‘内讧’，所以写了那样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书后》。现在我看了你这一篇《论胡适论〈容忍与自由〉》之后，内心感到舒服之至。你指出的很对，他把‘有影响’同‘有权势’混为一谈。这一关键一错，底下跟着全错。”

另外，海外学人周策纵先生也撰文对胡适“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一语进行了商榷：

“我们承认容忍是自由的一个基础，社会如果没有容忍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现代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过于密切，像蜂窠的每个巢穴互相密集着，有一个巢孔过度扩张时，别的孔就要被压缩变形了。同样地，一个人的自由也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自由的限制，即如穆勒所说的，自由必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所以我的自由常常建立在别人的容忍上，别人的自由也常常建立在我的容忍上。我多一分容忍，别人便可能多一分自由。是就这一意义说，容忍虽然有点像自由的必要条件，它是否为自由的充分条件，却还得看情况如何而定。换句话说，社会上没有容忍固然谈不到自由，但有了容忍是否就有自由，却要看这容忍的态度普遍到什么程度而定。中国的妇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不是容忍了几千年么，她们何尝得到婚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有许多专制政治和独裁政治下，大多数的人民往往容忍到了极点，但自由也不曾自动地降临，固然有许多被迫的服从不能算作容忍。原来一个社会里要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容忍而另一部分却可以不顾的时候，容忍还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我们若希望容忍发生好的效果，能作为自由的保障，必须社会上的人全体或大多数都多多少少能采取这种态度。”

周策纵认为要对“容忍”和“抗议”一视同仁，因为容忍与抗议同样重要，光有容忍或光有抗议均不能带来自由：

“抗议和容忍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在实质上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反对的。容忍的成立，和抗议一样，也必须建立在不同意的前提下。

“我的见解如有不同，就最好说出来，这样一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才能希望更接近真理。……穆勒在‘自由论’第二章的末

了，总结他替思想言论自由辩护的理由为四点，就是：一、对方的意见可能是真理；二、即使对方错了，也还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容或可补充我所认为真理的不足；三、没有对抗的言论则流行的思想将成为成见，引不起理知的体认；四、思想成为教条后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对人没有益处。这四件理由都可用来说明容忍的需要，同时，尤其是后面两点，也可支持抗议的必需。”

周策纵清醒地指出，容忍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不管对何事都容忍，且毫无限度，那你的容忍也许并非美德而有可能演变成一桩罪行：

“容忍的精神有时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因为容忍应该有它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容忍也可以鼓励别人来侵犯自由。照美国独立宣言的理想，自由本应是一种‘不可出让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为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结果所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响。”

最后，周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 1761 年的法国，有一个人的儿子因生意失利而吊颈自杀了。照当时的法律，凡是自杀的人，必须把他的尸体裸露着放在刑车上，公开在街上游行，然后挂到绞刑架上去。这父亲不忍他儿子死后遭受这样的待遇，便请了好些亲戚朋友来作证，证明（儿子）是寿终正寝的，于是谣言传布开来，竟说这父亲因为恐怕儿子要信旧教，所以把他谋杀的，结果（这个父亲）被判处了死刑。两年后，伏尔泰为了这事便写成他有名的《容忍论》，用鼓吹容忍来表示对用教条杀人的抗议。他满以为东方的非耶教徒更能容忍些，却料想不到两百年来人类并没有进化多少，因此我们仍需要用容忍论来作抗议。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走上巴士底的道路，我们应采取更平易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必须容忍抗议，必须抗议我们认为不该容忍的事，抗议的人更要容忍别人的抗议。这都是极平凡的道理。”

周策纵对胡适提出的话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延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